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研究综述

贾中正^①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原则、核心、理念和目标等，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深刻领会、全面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是学界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本研究基于对2024年国内外主要期刊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研究进展的梳理发现，相关文献重点关注了互联互通、开放体系、全球治理、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这些研究认为，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新路径，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提供坚实的学理性支撑，为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一带一路”倡议 互联互通 全球治理 和平发展 开放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推动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其精神、原则、核心、理念和目标等作了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各方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载体，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理论渊源、扎实实践基础、丰富理论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共产党世界第一大党、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提振全球经济复苏信心、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注入了中国力量，作出了中国贡献。

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巴以冲突尚未结束，以伊冲突又接踵而至，加之刚结束的印巴冲突，这些外溢效应引发地缘政治局势不断紧张升级；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卷土重来，逆全球化潮流风起云涌，

贾中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jiaazz@cass.org.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评论与建议，自负文责。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巩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难度仍然较大。对于这些困难与挑战，如何更好地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相关理论，对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遇到的国际重大现实问题进行跟踪和研究，是摆在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本研究梳理 2024 年在国内外主要期刊上刊发的研究成果，对“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最新进展归纳述评。这些期刊主要包括《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外交评论》、*China & 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c Review*、*The World Economy* 等，从中选取的 62 篇研究文献主要对互联互通、开放体系、全球治理、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题进行学理性阐释或理论性构建，运用交叉学科理论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系和架构来剖析和解决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 2024 年国内外主要期刊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的文献分布情况来看，《南方经济》以 6 篇的数量位居第一，约占刊发总数的 9.7%；其次为《国际金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均刊发 5 篇，约占总数的 8.1%；第三是《当代亚太》《外交评论》《世界经济研究》，均刊发 4 篇，约占总数的 6.5%。此外，《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等也刊发了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章。

从 2024 年国内外主要期刊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的研究议题分布情况来看，有关互联互通的研究文献最多，为 21 篇，占 33.9%；其次是有关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的研究文献，有 13 篇，占 21.0%；再次是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文献，为 12 篇，占 19.4%；然后是有关和平发展的研究文献，有 9 篇，占 14.5%；最后是有关完善全球治理的研究文献，有 7 篇，占 11.3%。这些研究选题意义重大，研究范围较广，研究视角新颖，研究结论稳健，对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性支持。

二、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

2017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①他在 2019 年 4 月 26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共建

‘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②这一表述直接点明了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他在 2014 年 11 月 8 日“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指出：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③这一“血脉经络”的提法，生动揭示了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生命力的支撑作用。十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球互联互通，取得了丰硕成果。

^① 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17 年 5 月 14 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7-05/14/content_5193658.htm。

^②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19 年 4 月 26 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26/content_5386544.htm。

^③ 习近平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14 年 11 月 8 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4-11/08/content_2776532.htm。

第一，以政策沟通不断夯实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政治基础。有学者从“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视角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互利共赢效应。罗知等（2024）^①基于2007-2019年的跨国数据并结合双边合作文件信息，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及其达成合作协议两个阶段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便增加了对沿线各国的援助，彰显了大国担当。当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后，中国会增加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共赢。“一带一路”强合作共识会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国的直接投资，弱合作共识则无此效果。机制检验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达成合作共识都对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加强营商环境“软联通”和人文交流“心联通”方面，则是“一带一路”合作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建议加大对“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果的宣传，强化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通过市场力量推动双边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共识等，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庞卫华和曾向红（2024）^②认为，土耳其提出“中间走廊”倡议意在建设连接欧亚的战略运输通道，作为提升东西方连通性的国际合作倡议，“中间走廊”与“一带一路”具有协同效应，在东西方交流合作中加深对接为自身发展带来新的历史契机。“一带一路”与“中间走廊”的对接将赋予全球贸易以新动力。推动“一带一路”与“中间走廊”对接对实现中国与欧亚国家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大有裨益。

有学者研究了欧盟成员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差异。钟准和魏康婷（2024）^③研究发现，成员国在欧盟中心-边缘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影响了该国对“一带一路”蕴含的经济机遇的需求程度。而国内政党政治的特征尤其是建制政党和反建制政党在对外政策“欧洲化”、财政偏好以及价值观外交上的差异，决定了该国是否会背离欧盟主流立场来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具体来看，有反建制政党执政的经济边缘国家都会签订“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而建制政党执政的中心国家大多未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有反建制政党执政的中心国家与建制政党执政的边缘国家的立场相对模糊且可能摇摆。对这反映出反建制政党的兴起以及欧盟内部的分歧对中欧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第二，以设施联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国际交通基础运输通道的不断完善有助于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自由流动以及经济空间格局的优化重塑。顾雪芹（2024）^④利用2006-2021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中欧班列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具有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城市开通中欧班列可以降低资源错配指数，并分别降低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扭曲程度。市场活力、资源流动和空间集聚在中欧班列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欧班列对城市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该研究从学理上解释了中欧班列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有助于明晰中欧班列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① 罗知、张一诺、向婷、柏杨（2024）：“大国担当与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评估”，《世界经济》，第12期，第3-34页。

^② 庞卫华、曾向红（2024）：“欧亚‘中间走廊’计划的演进及实践”，《现代国际关系》，第11期，第43-63页。

^③ 钟准、魏康婷（2024）：“中心-边缘、政党政治与欧盟成员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差异”，《欧洲研究》，第1期，第80-103页。

^④ 顾雪芹（2024）：“国际交通运输通道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试验”，《世界经济研究》，第10期，第121-134页。

因地制宜提升城市新质生产力。无独有偶，顾欣和杨亚丽（2024）^①也研究了中欧班列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作用。研究认为，中欧班列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交通纽带和空间载体，不仅提高了开通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也加速了所在区域的要素资源流动。其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促进了开通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中欧班列通过贸易开放效应丰富了创业机会并通过金融发展效应缓解了创业融资约束，从而使开通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提升。该研究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加速将中欧班列带来的机遇优势转化为当地的经济优势提供了参考。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了传统地缘政治向互联互通地缘政治转变，基础设施已成为全球最关键的互联互通领域之一。中国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促使美西方大国提出了各自的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战略，以同中国开展海外基建竞争。毛维准和马贊菲（2024）^②认为，美西方国家的基建竞争呈现出以规范竞争为竞逐核心、以倡议竞争为政策焦点、以项目竞争为表现形式、以机制竞争为攻防平台的整体逻辑，其目的是在基建竞争中建立起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基建方案，阻止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增长，并重塑自身对全球互联互通网络的领导力。面对中国倡导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全球基建网络，美西方国家以基础设施为场域，围绕基础设施的项目、要素和议题展开针对性的盯防、动员和捆绑。中国应立足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总体基建外交布局，积极应对美西方基建竞争的政策攻势，在深化海外基建建设过程中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中国基建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发展和创新持续影响和塑造当前地缘关系，同时也为地缘关系研究带来新的启示。金君达和徐秀军（2024）^③从数字技术发展对地缘空间的塑造作用出发，研究了复合型地缘关系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关系。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实践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强共建国家间的跨区域联系，突破了传统地缘空间限制，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带有地缘聚合效应的合作网络，展现出塑造复合型地缘关系的能力，并为复合型地缘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实例支撑。同时，数字技术支持下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也将持续塑造全球地缘关系的未来发展，促进地缘空间进一步融合，将为大国在数字和地缘空间的共存作出积极探索。

第三，以贸易畅通不断释放国家间互利合作的活力和潜能。司志宾等（2024）^④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一带一路”倡议对行业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显著提高行业出口质量。其通过促进“出口竞争效应”和“OFDI 逆向溢出效应”，最终使行业出口质量整体上得到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倡议对“一路”国家、较不发达国家以及低技术、价格竞争行业、优先发展行业具有更明显的“提质”效应。通过结构分解发现，行业出口质量的提高主要是由产品内效应和低质量产品的退出实现的。综合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该研究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贸易平衡

^① 顾欣、杨亚丽（2024）：“中欧班列开通是否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第3期，第157-174页。

^② 毛维准、马贊菲（2024）：“互联互通的地缘政治：大国基础设施竞争的行为逻辑”，《外交评论》，第5期，第1-26页。

^③ 金君达、徐秀军：“数字时代复合型地缘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价值”，《当代亚太》，第4期，第57-80页。

^④ 司志宾、秦凤鸣、程敏（2024）：“‘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行业出口质量升级”，《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第67-86页。

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解释。任婉婉等（2024）^①以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订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丝路电商”的贸易效应与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丝路电商”合作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贸易总额增长，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弥合数字鸿沟、促进规制融合、释放需求潜力四种渠道实现。“丝路电商”不仅有助于推动跨境电商产品、数字产品等外贸新业态的发展，还促进了合作方与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的双边贸易增长，具有显著的第三方效应。该研究为持续推动“丝路电商”合作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构建电子商务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理论支撑。

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Zhao et al. (2024)^②基于结构引力模型和一般均衡泊松伪最大似然法量化了BRI对全球农产品贸易尤其是对中国与BRI参与国家之间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BRI对全球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显著且积极的影响。BRI不仅改善了中国与其BRI伙伴国间的农产品贸易，还刺激了BRI参与国与非参与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这表明存在纯粹的贸易创造效应。BRI的影响在参与国之间存在异质性，尤其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上。从中国出口到非高收入BRI国家的农产品增加，而从中国出口到高收入BRI国家的农产品减少，这凸显了在与贸易伙伴制定贸易协议时考虑其具体经济地位的重要性。BRI对福利收益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消费者和BRI参与国的生产者。同时，BRI导致了中国农产品进口的重分配：进口来源地从美国和巴西转向邻近的BRI参与国家。葛明等（2024）^③从总体、动态、区域、产业四个维度逐层解析2002-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研究发现，进口需求效应占据主导地位，需求数量和价格水平增长均有显著贡献，虽然出口竞争力效应总体表现不佳，但是品类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小幅改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竞争力效应显著增长，特别是数量竞争力效应大幅改善，且上述效应在不同产业和区域既存在共性特征也具有一定程度差异性。

第四，以资金融通不断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栗宇丹和罗炜（2024）^④基于2006-2020年的跨境并购交易样本，从跨境投资交易成本的角度探究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我国企业跨境并购完成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与标的企业所在国（地区）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可降低双边关系成本、外汇监管成本及汇兑成本，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的完成率，平均可提升12%左右。当我国与标的企业所在国（地区）双边合作关系不够紧密、我国外汇储备净流出较多、标的企业所在国（地区）法定货币为非国际通用货币时，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较明显。对于收购方为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交易、全部采用现金支付的跨境并购交易和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发起的跨境并购交易，货币互换协议更能发挥作用。该研究结论表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对跨境并购交易具有促进作用，对金融服务我国企业“走出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一定参考价值。Zhan et al.

^① 任婉婉、林天汉、郝宇倩（2024）：“‘丝路电商’合作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国际贸易问题》，第9期，第123-139页。

^② Zhao, Y., Ji, C., Chen, Y., & Zhu, X. (2024). Who Gains, Who Loses?—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Bilateral Agricultural Trade. *China Economic Review*, 88, 102284.

^③ 葛明、贾怀勤、赵素萍（2024）：“恒定市场份额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及其应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分析”，《统计研究》，第2期，第3-14页。

^④ 栗宇丹、罗炜（2024）：“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企业跨境并购完成率”，《金融研究》，第10期，第132-150页。

(2024)^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减少了从非“一带一路”国家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并购，影响的两个重要机制分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跨境并购的增加和潜在的债务风险。Fang et al. (2024)^②研究发现，在减轻疫情对绿地投资的负面影响方面，“一带一路”参与国（地区）受到的冲击小于非“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稳健性检验也支持该倡议帮助“一带一路”参与国（地区）应对冲击所发挥的明显作用。

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方慧等(2024)^③采用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该研究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有学者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如何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的能源消费。Shinwari et al. (2024)^④采用2000-2021年2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全球FDI对能源消费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主导的FDI同样对能源消费产生积极影响。绿色技术(Green technologies)亦会增加能源消费。该研究强调了FDI政策与绿色技术在促进“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能源需求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马述忠等(2024)^⑤基于2009-2021年证券数据公司跨境并购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从双边信息流视角考察了国际海底光缆建设对中国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通过增加中国与直连国家间的双边信息流动促进了企业的跨境经济活动。在排除“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的干扰后，结论依然稳健。但该研究并未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否在海底光缆促进跨境并购中发挥重要作用及其可能作用的机制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

有学者研究了欧盟发展融资新制度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匡舒啸(2024)^⑥认为，欧盟新制度通过加强欧委会的管理协调职能，使发展融资服务于提升欧盟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大目标。欧盟不是简单地重新包装既有金融工具，而是在地理区域和投资领域选择上都更具战略性，也能更灵活地调动不同类型的发展融资机构并协调与成员国的援助资金。新制度对欧盟“全球门户”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一带一路”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

^① Zhan, C., Wang, H., & Hou, C. (2024). Doe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tract Cross-Border M&A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World Economy*, 47(5), 1916-1942.

^② Fang, J., Lu, Y., & Yao, S. (2024). 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Mitigate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Greenfield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World Economy*, 47(3), 1004-1031.

^③ 方慧、张潇叶、赵胜立(2024)：“‘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第212-232页。

^④ Shinwari, R., Wang, Y., Gozgor, G., & Mousavi, M. (2024). Does FDI A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es? The Role of Green Technologies. *Energy Economics*, 132, 107409.

^⑤ 马述忠、吴鹏、房超(2024)：“国际海底光缆、双边信息流与中国跨境并购”，《世界经济》，第4期，第3-30页。

^⑥ 匡舒啸(2024)：“欧盟最新发展融资制度改革及其对‘全球门户’战略的影响”，《欧洲研究》，第1期，第57-79页。

第五，以民心相通不断搭建共建国家之间的友好桥梁。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成效不仅体现在交通运输、贸易往来等领域，更是跨越山海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文明互鉴。徐震寰和李晨曦（2024）^①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在2015年才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并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影响幅度随时间推进有所增加。从国家内部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监督和治理，且对位于政府监督动机和监督能力较强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影响更大；从国家外部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督和关注，且对面临较大东道国监督压力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影响更大。运用三重差分法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社会责任效应在交通、能源、钢铁等重点行业中更加明显，但该效应在重点省份与其他省份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该研究拓宽了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相关理论，对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性。

有学者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就业效应做了研究。曾鑫等（2024）^②研究中欧班列开通的稳就业效应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且该结论在国有企业、处在中欧班列节点城市企业、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已有海外营业收入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中欧班列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出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三类方式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增加企业劳动力需求。中欧班列的开通还显著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该研究结论对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Liu & Ding (2024)^③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显著提升中国在非洲民众心中的形象。经济合作与媒体塑造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增加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援助、贸易以及文化交流来提升中国形象。

三、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他在2023年10月17日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④“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

^① 徐震寰、李晨曦（2024）：“大国重企：‘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第49-70页。

^② 曾鑫、黄炜、何凡（2024）：“跨境运输的稳就业效应——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第21-38页。

^③ Liu, Z., & Ding, Y. (2024). Enhancing China's Image in Africa: The Ro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 87, 102239.

^④ 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国外交部，2023年10月17日。
网址：https://www.fmprc.gov.cn/zjxw/202310/t20231017_11162504.shtml。

带一路”行稳致远。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把“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章，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第一，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向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开辟国际贸易新通道是新时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高质量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则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领西部欠发达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有学者研究了共建“一带一路”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对外开放的引领作用。汪田姣等（2024）^①基于2010-2022年中国31个省份层面的面板数据，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国际贸易新通道建设对中国“向西开放”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向西开放”，政策效应集中于主通道区域与沿海地区，且主要促进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与RCEP国家的向西出口开放水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主要通过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带来的贸易成本节约效应与市场资源的整合效应带动中国“向西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向西开放”效应存在可持续与可推广性质，其出口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合作共建的贸易创造而非贸易转移。该研究为中国开辟更多“向西开放”国际贸易新通道，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等“向东开放”传统问题提供经验证据，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政策启示。陈万灵等（2024）^②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参建通道经济的对外开放效应展开经验研究发现，参建通道经济持续带动了欠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开放与投资开放上涨6.8%与1.6%，但该效应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参建通道经济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建设，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与弥补欠发达地区不利的开放初始条件推动对外开放，但未能带动民心文化等“软联通”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国际开放大通道，推动欠发达地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联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开放特色显著，但开放不均衡的难题亟待解决。

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促进中国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胡留所等（2024）^③基于2000-2021年中国281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但该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从影响机制来看，公众关注度会影响生产要素配置，提升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效应来看，沿线城市虹吸周边地区的资源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该研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对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和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合作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提供了新动力。江英等（2024）^④通过分析2006-2021年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影响

^① 汪田姣、陈金源、温可仪（2024）：“国际贸易通道建设与中国向西开放——来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第3期，第101-120页。

^② 陈万灵、陈金源、温可仪（2024）：“参建通道经济能促进欠发达地区对外开放吗——来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经验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1期，第105-121页。

^③ 胡留所、胡健、卢山冰（2024）：“‘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第87-104页。

^④ 江英、车港永、唐丹玲（2024）：“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第11期，第31-61页。

城市创业活跃度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通过优化产业兼容性、推动研发投入和发挥人才集聚效应等方式，促进了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增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邻近城市创业活跃度产生了空间外溢效应。

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学者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提升共建经济体与全球的关联以及能否起到深化各国合作机制的作用和践行发展共享互惠新理念。黄赛男等（2024）^①选取59个经济体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三季度跨国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一带一路”倡议能否促进共建经济体的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共建经济体的全球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总规模显著增长。从金融账户子项目来看，对共建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入相比其他经济体增长更显著，说明世界各国更倾向于在共建经济体开展投资。共建经济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流出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比其他经济体有更大规模提升，即共建经济体更愿意积极地“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机制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机制促进共建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该研究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新视角和新证据，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政策参考。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发展的影响。彭昕（2024）^②认为，得益于制度功能的多重性特征，制度制衡、规范及治理功能的综合蓄力最终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扩员。随着组织功能从非传统安全向经贸、人文等议题的全面扩展，借由“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等主要成员国间的战略对接，制度治理功能也通过协调外部机制得到提升。这对促进发展中国家构建新型国际合作制度，加强多边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鉴于当前研究大多侧重于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果，有学者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效应。陈冲等（2024）^③通过建立三重差分模型利用大数据和潜因子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双边关系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双边外交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呈现相当程度积极的外交政策效应，但因相关国家的身份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对这些国家与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也形成不同的影响。对于美国盟友和东盟等国家而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会推动这些国家选择“对冲”战略。而对于与中国存在双边投资协议的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来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则会改善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或增加其对中国的国际支持。因此，在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效应时不能笼统加以判断，而需考虑其他异质性因素的影响。该研究为系统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政策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是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海外园区的高效建设则是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抓手。刘震等（2024）^④基于增加值视角从附加值、

^① 黄赛男、张爽、王腾、曾松林（2024）：“‘一带一路’倡议能促进共建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吗？——基于金融账户子项目的视角”，《国际金融研究》，第11期，第40-50页。

^② 彭昕（2024）：“制度功能的多重性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外交评论》，第2期，第131-154页。

^③ 陈冲、漆海霞、管浩（2024）：“‘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效应——基于大数据双边关系衡量的分析”，《外交评论》，第5期，第27-54页。

^④ 刘震、潘雨晨、陈志成（2024）：“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如何影响‘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基于增加值视角”，《南方经济》，第4期，第74-93页。

价值链地位和技术水平三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通过提高附加值和技术水平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分区域来看，东亚地区通过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提高附加值、价值链地位及技术水平在三个维度上实现利益共享，南亚和东欧地区嵌入度显著提升附加值和技术水平，中西亚地区通过嵌入中心度提升附加值与技术水平。具有较强合作意愿的海外园区嵌入度显著提升附加值、价值链地位及技术水平，潜在合作意愿网络嵌入仅通过嵌入中心度提升附加值及技术水平。“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对发展中国家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了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对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的正向影响。该研究为通过海外园区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科学可行的实现路径。

有学者探究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牛华等(2024)^①利用2006-2020年中国贸促会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包容性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愈加明显。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结构升级和跨境供应链延伸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影响东道国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制。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包容性增长具有联动效应，且境外经贸合作区没有加剧东道国环境污染。该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为各经济体谋求经贸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现实依据。Liu et al. (2024)^②研究了2010-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建立的123个海外产业园区，以探究其对东道国生产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海外产业园区，特别是高科技、物流、多元产业及国家主导的园区，通过促进贸易和创造就业，显著提升了当地的生产能力。在治理水平、营商环境、金融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水平以及双边投资保护程度越高的东道国，这种效果越显著。该研究为中国产业园区的溢出效应提供了有力证据支持。钟坚和冯峥(2024)^③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能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数字企业集聚程度，且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发挥联动作用，共同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企业集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27日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④基于此，国内有学者研究了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小而美”项目的成效。孙灿(2024)^⑤基于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和个人/人群的直观感受提出“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解释框架，认为作为结构抓手的“大援外”体系与作为单元抓手的“小而美”项目存在互构与相互赋能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通过优化民生体验、促进成果转化和提升共治水平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需求价值、能力价值和共生价值，塑造了“一带一

^① 牛华、宋香凝、李震宇(2024)：“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否促进东道国包容性增长”，《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第34-51页。

^② Liu, H., Wang, C., Zhang, Q., & Wang, Y. (2024). The Impact of Chines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on the Productive Capability of BRI Host Countr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85, 102183.

^③ 钟坚、冯峥(2024)：“制度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企业集聚：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世界经济研究》，第9期，第3-18页。

^④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年8月27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27/content_5316913.htm。

^⑤ 孙灿(2024)：“‘大援外’体系中的‘小而美’项目——‘一带一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机制研究”，《当代亚太》，第5期，第4-27页。

路”提升全球普惠发展的微观机制要义。鲁班工坊是“小而美”项目的典范，有效增进了全球普惠发展的各价值内涵，使其具备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全球普惠发展最佳实践的可能，印证了该研究中微观机制解释的有效性。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应坚持以全球普惠发展为目标引领，继续深挖“大援外”体系中“小而美”项目的潜能，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作用，扩展投向范围；发挥成套项目的积淀作用，深化资源整合；发挥“一带一路”的扩散作用，提升国际影响。

针对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诬陷和抹黑，有学者做了批判性研究。当前，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提出两种错误解读，一种观点认为，该倡议主要受中国地缘政治野心驱动；另二种观点则宣称该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制造“债务陷阱”，通过隐藏真实债务规模企图最终攫取其建设的基础设施。Posta & Liu (2024)^①通过批判性梳理现有研究文献，对上述两种论调提出了质疑。研究认为，中国的核心动机并非地缘政治考量，而是旨在推动西部省份发展，将内陆地区转化为陆路联通枢纽。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重要事实——各大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已被区域性银行充分记录在案。所谓“债务陷阱”的叙事连同“资产攫取”假说及其他相关批评早已被多位学者证伪。

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公共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8 月 27 日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时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②同时，他还就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他在 2019 年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演讲中提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③2022 年 10 月 16 日，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④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旨在推动包容性全球发展，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欠缺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公正不合理不适应的内容越来越多，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横行，小圈子小集团思维浓重，片面渲染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代表性、公平性不足，南北贫富差距依然显著，各国内

^① Posta, P. D., & Liu, Q. (2024).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Unjustified Discontents. *China & World Economy*, 32(6), 160-186.

^②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 年 8 月 27 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27/content_5316913.htm。

^③ 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外交部，2019 年 3 月 26 日。网址：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zl_674979/ywzt_675099/2019nzt/xjpdylmf_696323/zxxxylmngf_696325/201903/t20190326_9277783.shtml。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22 年 10 月 25 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部贫富悬殊持续扩大，不平等的发展样态复杂多元；全球治理赤字更加突显，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构成严峻挑战。中国倡导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全球治理的前进方向，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展现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和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吴志成和徐信高（2024）^①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和部分领域的引领者，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凝聚合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树立成功典范；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发展夯实国家基础，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担当。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战略界已将制衡该倡议纳入对华战略的总体布局。这一制衡呈现出全球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竞争的态势。张茜（2024）^②认为，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美国和西方战略界极易从地缘经济的视角审视和揣测“一带一路”倡议，视它将在规则标准、国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等诸多领域对美国构成持续的现实挑战，具有重塑欧亚大陆地缘经济格局乃至全球新秩序的潜力。基于这一认知，美国将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抓手，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以构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为先导，以重塑“去风险”全球供应链为核心，用资本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围剿“一带一路”倡议。然而，美国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也面临诸多国内外因素的掣肘，主要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障碍和财政约束是最大牵绊、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目标错位将导致其难以实现战略协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拉拢逐渐变得力不从心。对中国而言，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加强和完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构建，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有效地管控和防范美国制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风险。樊海潮等（2024）^③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外部经贸冲击与国内产品和要素流动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以中美关税上升为例定量评估了外部经贸冲击对中国实际GDP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可以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实际GDP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多双边和多领域经贸治理体系建设，如继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等，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促进互利互惠，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持续复苏的轨道。

有学者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新视角。汪青等（2024）^④基于2000-2020年130个经济体的样本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共建国外部失衡变动的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减轻了共建国的外部失衡程度，对全球经济治

^① 吴志成、徐信高（2024）：“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第3-28页。

^② 张茜（2024）：“美国制衡‘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逻辑、路径及限度”，《美国研究》，第3期，第52-84页。

^③ 樊海潮、丁关祖、张丽娜（2024）：“外部经贸冲击、国内要素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7期，第151-169页。

^④ 汪青、杨权、刘文华、陆茸（2024）：“‘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基于外部失衡的视角”，《国际金融研究》，第6期，第40-51页。

理呈现出积极的作用，且该结论有效性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外部失衡缓解效应对收入处于中高等、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经常账户持续逆差的经济体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权益资产规模提升与结构优化渠道对共建国外部失衡的缓解产生积极作用。该研究在有效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在实践层面为推动外部失衡的调整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政策参考。陈兆源等（2024）^①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普遍偏重社会治理的思路不同，中国的发展经验及知识传递更加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其基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面板数据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比较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治理能力具有整体上的提升效应，且对经济发展阶段较低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升效应更大。该研究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起源提供了来自国际经济因素的新解释，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还有学者研究了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的经济纠纷治理问题。杨玲丽等（2024）^②研究发现，微观层面的企业社会资本投资显著影响了中资企业面临经济纠纷的解决机制选择。中资企业的社会资本投资越多，在发生经济纠纷时采用协商等低成本解决方式的概率越大。宏观层面的国际关系因素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治理效能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其中，东道国良好的政治环境、双边关系可以有效替代社会资本投资，良好的中国产品及国家形象能够显著促进社会资本的治理效能。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对经济纠纷的治理效能国家和城市类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东南亚国家的促进作用大于非东南亚国家，在商业城市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非商业城市。基于此，该研究建议海外中资企业要注重加强对东道国的社会资本投资，加强双边关系，加大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力度，助力企业社会资本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纠纷的治理效能。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理念不断深化，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更加紧密，绿色低碳投资理念更加深入，生态环保支撑服务更加有力，共建国家环保能力不断提升，不仅已经成为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鲜明主题，而且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可持续发展新机遇。有学者就国际气候援助资金的环境效应开展研究，从学理上支撑了高质量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必要性。张晶和朱绪东（2024）^③借助经典的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国际气候援助资金能够有效提升接收国环境质量，然后采用2000-2019年126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从经验层面验证理论有效性。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气候援助资金显著降低了共建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改善了它们的环境质量，彰显出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上的大国责任担当。该研究为倡导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气候治理中提供了经验支持，为高质量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技术支撑。

五、共建“一带一路”为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新路径

^① 陈兆源、马凯云、马亮（2024）：“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与东道国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政治科学》，第2期，第1-38页。

^② 杨玲丽、张清源 周奕旭（2024）：“社会资本投资与企业海外经济纠纷的有效治理——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中资企业的实证数据”，《南方经济》，第12期，第105-123页。

^③ 张晶、朱绪东（2024）：“国际气候援助资金的环境效应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11期，第28-39页。

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5 月 14 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强调，“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①为世界擘画了“一带一路”的美好前景。和平之路是“一带一路”未来愿景的首要之意，既是因为“一带一路”谋发展、求繁荣，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也是因为“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

相较于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应，有学者从改善全球治理、破解和平赤字方面研究了“一带一路”的和平效应。曹国强等（2024）^②基于 2006–2019 年乌普萨拉冲突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内部冲突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抑制了参与国内部冲突，并且随着一国参与时间的延长，抑制效应会边际递增。进一步检验显示，改善民生状况和提升协商民主水平是这一因果效应的重要机制。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改善了参与国的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民生状况，从而提高了民众参与冲突的机会成本，缓和了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稳定了国内局势。另一方面，倡议秉持的“共商”理念得到了广泛实践和深入内化，使得参与国的协商民主水平显著提升，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分歧，国内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冲突随之明显减少。此外，“一带一路”倡议释放的和平效应在冲突规模、合作内容、参与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美国政治关系等维度表现出较大异质性。这表明，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平台，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强大动力和牢固纽带。王孝松等（2024）^③基于“冲突–合作”视角测算国际关系的度量指标并使用 2015–2022 年的月度面板数据考察国际关系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关系的恶化将显著抑制跨国并购活动，以东道国为施动方衡量的国际冲突对跨国并购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强将抑制跨国并购活动；舆论关注的增多将显著增强国际关系恶化对跨国并购的抑制效应。国际冲突通过抑制政府层面高层交往和降低民间层面民众好感度，提高投资遭到东道国政府反对和民众反对的可能性，进而抑制跨国并购。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东道国的并购活动，虽然仍受国际冲突的影响，但相较非“一带一路”国家，其投资信心具有一定韧性。即在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样本组中，国际冲突对跨国并购的抑制作用要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或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发国家中政策性支持能助力中国企业跨国发展。

在稳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诬陷和战略遏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面对的重要风险。相关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并对西方媒体主导的“债务陷阱论”等谬论作了有力驳斥，并提出中美两国应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杜晓君等（2024）^④基于地缘政治理论考察了域外大国（美国）干预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缘政治风险显著

^① 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17 年 5 月 14 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7-05/14/content_5193658.htm。

^② 曹国强、谢建国、廖陈成（2024）：“‘一带一路’倡议的和平效应”，《世界经济》，第 6 期，第 3–35 页。

^③ 王孝松、袁佳圻、冯晟（2024）：“国际关系与跨国并购——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 9 期，第 20–38 页。

^④ 杜晓君、唐晨曦、祁乔、冯飞（2024）：“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政治’双重逻辑”，《南方经济》，第 8 期，第 90–114 页。

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特定国家的投资倾向。东道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能显著弱化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在域外大国的盟国体系内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且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说明面对域外大国强大的关系性权力，经济依赖的“压舱石效应”是脆弱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国家层面的发展潜力和企业层面的竞争潜力是引发域外大国对中国威胁认知和权力消长认知发生剧变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多的东道国以及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大规模投资上，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该研究拓展了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考量范围，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投资区位的战略布局具有启示意义。有学者研究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相关参与方债务的影响，对西方建构的“债务陷阱论”进行了有力驳斥。王珊珊和黄梅波（2024）^①基于2011-2019年54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主权债务占GDP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降低了参与该倡议非洲国家外债流量占GDP的比重，且该结论在经过时间异质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等检验后依然稳健。多样化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非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更多。“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经济增长、出口、投资、基础设施等中介效应降低非洲国家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曹国强等（2024）研究发现，美国因素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应的释放，这反映了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遏制作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应管控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积极引导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提升中间品的全球配置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首要保障。熊永莲和张誉夫（2024）^②使用2000-2013年工商和海关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学者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国家电力贸易的影响。Gu et al.（2024）^③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国家内部的电力贸易产生积极影响。这表明大多数国家通过维持或增加与其他可互联国家的电力贸易来确保能源供应，以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该研究为沿线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启示——若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定区域统一标准来推动区域电力互联，将有助于应对不确定性并促进发展。

中国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中国“倡议外交”的重要抓手。吴凡（2024）^④认为，新时代中国“倡议外交”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将发展问题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协调推进全球发展治理和全球安全治理，进而通过开展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边境安全事关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① 王珊珊、黄梅波（2024）：“‘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国家主权债务水平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检验”，《国际金融研究》，第3期，第26-38页。

^② 熊永莲、张誉夫（2024）：“‘走出去’促进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了吗？——基于出口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的视”，《南方经济》，第10期，第94-111页。

^③ Gu, X., Wu, X., & Luo, G. (2024). Can Power Interconnection Buffer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nergy Economics*, 135, 107625.

^④ 吴凡（2024）：“新时代中国‘倡议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国际关系》，第11期，第118-136页。

李志斐（2024）^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跨境区域化发展和地区的格局形成，边境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跨境资源交流、安全问题联动、利益共生共存的独特空间场域。跨境区域化的发展对边境安全治理也提出了新要求。在理念上，需要坚持政治固边、经济兴边和强军固防并举，推动实施新周边外交理念，推进新周边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价值认同构建。在路径上，应强化“五位一体”的边境安全管理体系，加强边境安全区域治理的双边、多边机制建设和平台搭建，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推进边境安全的协同性和综合化治理。

有学者研究了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潘子纯等（2024）^②基于 2002-2021 年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56 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定量分析进口国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国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抑制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且以私人及其财产为目标的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进口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会缓解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为此，应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通过区域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加强沿线国家防范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

六、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提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积极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代表了历史进步、时代潮流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 8 月 27 日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③他在 2019 年 4 月 26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我们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步向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他在 2021 年 11 月 19 日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⑤深化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的定位。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一带一路”这个根植于历史厚土、顺应时代大势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走深走实、行稳致远，在高质量发展中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为各国开拓出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放眼未来，这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将继续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新平台，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强动

^① 李志斐（2024）：“跨境区域化发展与新时代中国边境安全治理”，《外交评论》，第 6 期，第 1-23 页。

^② 潘子纯、马林燕、田蓬鹏、朱玉春（2024）：“进口国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第 9 期，第 142-164 页。

^③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 年 8 月 27 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27/content_5316913.htm。

^④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19 年 4 月 26 日。网址：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89301.htm。

^⑤ 习近平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21 年 11 月 19 日。网址：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9/content_5652067.htm。

力和更大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刘燕（2024）^①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契机，回顾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评价，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促进合作、共享繁荣与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平台。周进（2024）^②也研究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发展成为惠及全球发展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韦东明等（2024）^③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并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该研究对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尤里·塔夫罗夫斯基（2024）^④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成效显著，已成为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发展的地缘经济轴心。“一带一路”倡议是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有效模式。

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福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实践。有学者从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视角研究了人民币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的影响。汪天倩和朱小梅（2024）^⑤基于修正的二阶段Frankel-Wei模型对人民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样本期的分段动态检验发现，人民币对沿线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已超过英镑，和日元基本相当，但和美元、欧元之间尚有较大的差距。目前，人民币对“一路”沿线的锚效应整体高于“一带”沿线国家。虽然人民币对沿线国家的锚效应水平不高且并不稳定，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以来其产生显著锚效应的沿线国家数量有较多的增加，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产生显著锚效应的区域也已逐渐形成。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还是“一带”沿线及“一路”沿线两个区域，在是否选择锚定人民币及已锚定人民币的国家中，人民币锚效应大小的影响因素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方霞等（2024）^⑥也基于Frankel-Wei模型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区域货币锚效应后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锚定人民币能有效提高各国社会福利，且其边际效应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这在社会福利成长阶段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人民币区域货币锚效应通过提高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

^① 刘燕（202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大前沿问题研究（2023）”，《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第143-159页。

^② 周进（202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论述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第96-105页。

^③ 韦东明、谢尚、张辉、王桂军（202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第61-76页。

^④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2024）：“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意义——访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尤里·塔夫罗夫斯基”，陈爱茹译，《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第13-18页。

^⑤ 汪天倩、朱小梅（2024）：“人民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锚效应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第1期，第72-90页。

^⑥ 方霞、杨振宇、周龙平、赵平（2024）：“人民币区域货币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效应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第123-139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福利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民币区域货币锚效应对低收入、“陆上”丝绸之路、低贸易竞争力、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水平高的国家社会福利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在 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后，人民币区域货币锚效应对沿线国家社会福利的提升作用得到加强。锚定美、英、日、欧四种货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福利无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研究从汇率制度选择的视角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福利水平，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有学者从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共同体视角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研究。田利辉等（2024）^①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促进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通过激励企业创新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力总需求，但主要提升高技能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增加对高学历群体的劳动力需求；数字化能够扩大出口贸易，企业拥有网站和使用电子邮件等数字化工具有助于贸易便利化。中国开展对外技术援助有效推动了信息技术和知识外溢，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字化建设，显著推动溢入国经济增长。该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共同体，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刘友金等（2024）^②利用 2010-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沿线国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总体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 U 型关系，经历了由技术鸿沟到技术追赶的转变。沿线国家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技术差距之间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推动 U 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加快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追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部分沿线国家的技术追赶存在“小国困境”，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相较于规模较大的沿线国家更难实现技术追赶。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具有“拉拔效应”，有利于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突破规模局限，摆脱“小国困境”实现技术追赶。中国倡导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可以帮助沿线规模较小国家突破“小国困境”，助推技术追赶，实现共同发展。该研究从技术追赶视角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一带一路”数字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数字合作领域的新尝试，“丝路电商”国际合作肩负拓展中国数字贸易合作伙伴、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的使命。叶世雄和蔡一鸣（2024）^③基于 OECD 和 WTO 的平衡服务贸易数据集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丝路电商”国际合作显著提高了中国对伙伴国数字服务部门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制度距离缩小、数字技术合作和跨境电商发展是“丝路电商”国际合作产生贸易效应的可能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丝路电商”主要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和 ICT 服务出口，且上述贸易效应和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实际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高质量发展“一带一

^① 田利辉、李政、李鑫（2024）：“数字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证据”，《国际金融研究》，第 2 期，第 39-49 页。

^② 刘友金、张颖斌、蔡翔（2024）：“从技术鸿沟到技术追赶：数字经济发展效应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经济研究》，第 11 期，第 192-208 页。

^③ 叶世雄、蔡一鸣（2024）：“‘丝路电商’国际合作如何影响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世界经济研究》，第 1 期，第 89-104 页。

路”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吕越和田冀霖（2024）^①采用2009-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测度了企业层面的数字创新水平，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问题。研究发现，中国上市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在2009-2019年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提升。机制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合作创新及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种渠道提升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则表明，这一积极效应对于新兴优势行业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及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有学者研究了“全球南方”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王金强等（2024）^②认为，在新时代，中国倡导的“全球南方”与“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密切相关。在实践中，中国将继续以“一带一路”为合作平台推动全球南北合作，确保“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外交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中动态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且引领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迈进。田诗慧和郑先武（2024）^③认为，大国竞争格局为小国提供了倡导和设置区域议程的契机与政策空间。在“印太”海洋议题演进中，中美在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分别以中国“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网络和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为基础，围绕海洋议题主导权展开竞合互动。中国应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双多边合作；从功能性合作领域着手，逐步扩展至全领域的海洋合作；在敏感性议题上，管控大国危机，弥合分歧，推进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和议题引领；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打造更包容的亚太海洋新秩序。

七、总体评价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对该倡议的精神、原则、核心、理念和目标等作了系列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学界深刻领会并认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为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提供了学理的支撑。总体而言，2024年国内外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进展呈现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重点议题聚焦。梳理评述2024年国内外主要期刊刊发的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题。这些议题既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的要点，也是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二是研究方法创新。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中的重要议题，国内外学者不断创新研究方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等，特别是引入经验研究进行量化分析，提升了论证逻辑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在这些研究方法中，双重差分法（DID）的使用

^① 吕越、田冀霖（2024）：“‘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第74-91页。

^② 王金强、崔文星、曲舒怡（2024）：“‘全球南方’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当代亚太》，第6期，第4-31页。

^③ 田诗慧、郑先武（2024）：“中国—美国—东盟三方海洋议题竞合中的东盟角色”，《当代亚太》，第2期，第4-30页。

较多，较好地捕捉到“一带一路”倡议对主要研究对象的净影响效应，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是研究结论稳健。国内外研究文献采用多维度、多视角、多方法等方式，对相关议题的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验证，最终得出可信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认为，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新路径，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从学理上论证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而且为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

四是相关研究有待深化。归纳梳理 2024 年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文献可见，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各有侧重，总体上议题较为宽泛，存在诸多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利用好人工智能实现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文明交流互鉴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等，对这些议题开展更有深度的研究，或是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研究需重点关注和着力推进的方向。